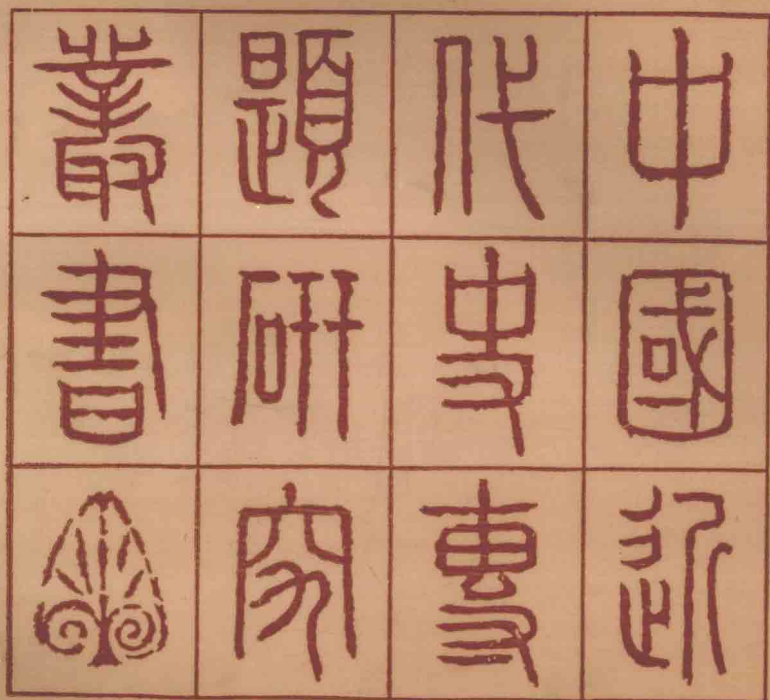


# 曾國藩傳

朱 东 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丛书

# 曾国藩传

---

朱东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特约编辑：刘良富

责任编辑：孙毅

封面设计：邱云松

版面设计：陈维

封面题字：梁伯言

## 曾国藩传

朱东安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 12.5 插页5 字数 287 千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200册

书号：11118·172

(平装)定价：3.05 元

## 前 言

曾国藩（1811—1872）是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一百多年来，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派别、甚或同一派别的不同人物，都曾对他作出过不同的评价。

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徽号。曾国藩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sup>①</sup>；他的门生故吏则颂之为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独尊程、朱的理学家和革命党人开始对曾国藩进行思想和政治上的批判。有人说他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厘聚敛”<sup>②</sup>之风，“以夷狄攻中国”<sup>③</sup>，“杀人割地”<sup>④</sup>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sup>⑤</sup>；也有人斥他为“残杀同胞”的败类，“遗臭万年”的“汉奸”<sup>⑥</sup>。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则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称曾国藩“誉之则为

---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传忠书局版，首卷，第5页。

②④ 夏震武：《灵峰先生集》，浙江印刷公司版，第4卷，第56、57页。

③ 《灵峰先生集》，第1卷，第1页。

⑤ 同上，第4卷，第42页。

⑥ 《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卷，第82页。

圣相，讫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sup>①</sup>。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性质急剧变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适应新的形势，曾国藩提出一整套解决国内、外矛盾的方针、路线和办法，并取得一定成效，故受到一些阶级和政治派别的竭诚拥护，为其继承下来，尊为圣典。但是，这条路线终究归于失败：事实证明它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因而受到另一些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坚决反对，口诛笔伐，视若寇仇。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整个近代史上，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一直未有根本改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则不时出现在人们面前，尤其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更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议题。这样，曾国藩就不能不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而对他的评价也不能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显然，在这种形势下，欲将曾国藩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加以探讨，要求人们的认识不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是很不现实的。

今天时代已经不同了，完全有条件把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进行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更向前深入一步。然而，曾国藩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要弄清他的问题，需要广博的历史知识和较高的理论修养，就笔者目前水平而言，这是很难办到的。因而，现在所匆匆草就的这个小册子，只能是在前人基础上所作的一个初步尝试，浅陋与谬误之处一定不少，望读者不吝赐教，匡我不逮。

---

<sup>①</sup> 许一山：《曾国藩传》，1964年台北版，第2、3页。

# 目 录

## 前言

<b>一 跻身六曹（1811—1852）</b> .....	1
时代与故乡 .....	1
家风与影响 .....	6
读书与科第 .....	11
学术研究与交往 .....	12
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	24
革除弊政的尝试 .....	28
<b>二 创建湘军（1853—1854）</b> .....	41
应命出山 .....	41
办团练勇 .....	49
改革军制 .....	64
编练成军 .....	76
<b>三 坐困江西（1854—1857）</b> .....	83
初战败绩 .....	83
攻占武昌 .....	93
湖口惨败 .....	98

	罗走塔灭·····	104
	委军奔丧·····	111
<b>四</b>	<b>决战安庆（1858—1861）</b> ·····	<b>118</b>
	再次出山·····	118
	援浙之行·····	122
	进围安庆·····	127
	总督两江·····	132
	拒不北援·····	143
	困守祁门·····	148
	攻陷安庆·····	155
<b>五</b>	<b>攻陷天京（1862—1864）</b> ·····	<b>167</b>
	督办四省军务与三路进兵之势·····	167
	进退之争·····	177
	孤城难下·····	186
	独占“头功”·····	195
	天京浩劫·····	204
	“大功不赏”·····	213
	裁湘留淮·····	221
<b>六</b>	<b>剿捻失败（1865—1867）</b> ·····	<b>232</b>
	坐观成败·····	232
	剿捻无功·····	239
	被劾回任·····	254
<b>七</b>	<b>悒郁而死（1868—1872）</b> ·····	<b>267</b>
	中兴幻想的破灭·····	267
	忍辱求和·····	280
	千夫所指 悒郁而死·····	291

<b>八 承往古衰朽之续 开近代风气之先</b> .....	297
从理学家到洋务派.....	297
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	326
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	352
<b>附录一 大事年表</b> .....	358
<b>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b> .....	389
<b>后记</b> .....	392



## 一 跻身六朝

(1311—1352)

### 时代与故乡

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其国体政体无异于前代，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上，明显地带有一种族歧视的痕迹。

早在入关之前，满洲贵族就实行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入关之后，他们尤为重视拉拢汉族士人参加政权，在中央各部、院的官职设置上，使满汉缺额，即官员编制中满人与汉人的数量相当，对地方官员的任命也采取满汉参用的做法。从而拢络了汉族地主，扩大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然而，满洲贵族对汉族官吏常常存有戒心，设计防范，不使他们掌握实权，尤其是军权。

清朝政权的中枢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各项行政。内阁仅康熙一朝较有实权，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之后，便失去实权，变成例行公事的机关。总揽一切大权的是军机处，重大问题都在这里讨论，由皇帝作出决定，向全国发号施令。所以时人和后人皆称军机处为“政府”。

军机大臣由皇帝在亲王、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堂官（尚书、侍郎等）中特简任命，并有军机大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分别，按固定顺序排列。皇帝还指定一名亲王或大学士为首席军机大臣，称为“领班”，又称“首枢”。首席军机大臣多为满人，仰仗皇帝的倚重，总揽大权，汉员没有多少发言权，即使提出正确的意见也往往不受重视。鸦片战争时期的军机大臣王鼎，就是为起用林则徐一事，在道光皇帝面前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一再苦争无效，愤而自杀的。六部的实权也都掌握在满员手里，汉员往往不过是随同画诺而已。掌握清朝地方大权的官员是总督和巡抚，而总督的权力尤重，各地绿营兵及其长官提督，即受总督管辖。为防止汉族官员掌握军权，总督多任命满人，汉员不多。对于身任疆寄的汉族地方督抚，清廷有时也放心不下，往往指使满员暗中监视，密报他们的动向。对于一些地位不高但颇有实权的员缺，也限制汉员插足。例如掌管户部三库锁钥的下级司员和地处北京后方的热河道道员，就限任旗员，不用汉人。此外旗员还享有其他种种特权，遇婚、丧、疾病皆可请假，假满复职。汉员遇父母丧葬必须回籍守制三年，遇结婚或久病不愈也要开缺，服阙或假满之后，除内阁中书等少数员缺外，都须重新入班候补，不能径复旧职。至于科考、补缺、升迁的难易，满汉之间更是悬若天壤了。

清王朝创立初期，几代统治者都颇为善于治理国家，其文治武功并不稍逊于汉唐盛世。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的发展，乾隆之世达到鼎盛时期。乾隆后期各方面矛盾开始暴露，贪污成风，吏治败坏，朝政日趋紊乱。奸相和珅的用事，更加速了这一腐化过程。乾隆死后，嘉庆帝虽然处死和珅，惩办了一批罪恶昭著的官吏，但无力扭转这一衰败趋势，贪风不止，腐败日甚，直

至道光末年无稍改变。与政治上日趋腐败的同时，清朝的财政与军事状况也渐形恶化。乾隆中期以前，清朝财政每年收支相抵，尚有盈余，及至嘉庆末年，国库已日呈入不敷出之势。清朝开创之时，主要依靠八旗，绿营仅起辅助作用。俟平定三藩时，八旗业已腐败，战斗力大为削弱，攻取战胜，全仗绿营苦战之力。乾隆后期，绿营又重蹈八旗复辙，嘉庆初年镇压五省白莲教大起义，主要靠各地团练武装追堵拚杀，绿营不过效八旗故伎，冒功而已。

随着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负担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乾隆中叶以后，长期潜伏民间的各种反清团体，诸如白莲教、天地会等及其名类繁多的支派，逐渐活跃起来，零星的个别反抗渐渐发展为有组织的起义。1774年王伦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支派）在山东首举义旗，接着发生了甘肃回民新教徒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此伏彼起，旋兴旋灭，但却揭去了清王朝太平盛世的面纱，引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于1796年首先在湖北荆襄地区爆发，很快发展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清政府征调半天下，耗银二亿两，花了九年的时间才把它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成为清王朝由盛到衰的契机。从此，各地起义、变乱不断发生，此伏彼起，殆无宁岁。

正当这个老大帝国腐败日甚，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的时候，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乘机打了进来。1840—1842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清朝军队，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法、美等殖民主义者接踵而至，纷纷效尤，遂将中华民族推入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鸦片战争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之下，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起义和反抗更加频繁，尤其在鸦片战争中首当其冲的

两广和湖南。1840至1850年间，这里几乎年年有起义发生，其中最著名者是1847年的湖南雷再浩起义和两年后再度发动的雷再浩旧部李沅发起义。此伏彼起的群众反抗斗争的涓涓小溪，终于汇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1851年发生在广西金田村的拜上帝会群众的武装起义，把农民反封建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全国掀起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高潮。

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湖南的经济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清代的道光年间，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于不发达省份。王闿运说湖南“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星，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sup>①</sup>。曾国藩也称湖南为“山国荒僻之亚”<sup>②</sup>。所以，“道、咸前湘士殊少知名”<sup>③</sup>。

同时，湖南的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也较为尖锐复杂。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多种民族杂处，分别与川、黔、两广接壤，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一遇天灾人祸，往往发生起义或变乱。乾隆末年的湘黔苗民起义，使清政府调兵转饷倾动七省，成为持续九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前奏。道光以来，各地起义更加频繁。1832年瑶族赵金龙起义，四年后又发生蓝正樽起义，而小规模的反抗和冲突则几乎年年不断，无地不有。这种频繁的动乱和极不安定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湖南地主阶级所特有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这点上，他们与安逸舒适的江浙地主有着明显不同。

另外，湖南北阻大湖，境内多山，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

---

① 王闿运：《湘军志》，光绪十一年版，第1卷，第一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文集》），第4卷，第58页。

③ 湖南省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1949年版，第2辑，第405页。

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响。

湖南的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状况，造成湖南学术界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致用。理学兴于北宋而成于南宋，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因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出于二程门下（二程又师承于周敦颐），所以理学以朱熹为正宗，称为程朱理学，又称宋学、道学或洛（二程）闽（朱熹）之学，关（张载）濂（周敦颐）洛闽之学。理学对湖南的思想学术影响很深。周敦颐籍隶湖南道州，“濂溪”先生的称号就来源于他家乡一条河流的名字。北宋初年创建的长沙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常有著名学者在此讲学。南宋时，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弟子达千人。其后，学术界虽然经过心学、实学的几度变迁，又有清代训诂考据之学兴起，但都对湖南士人影响甚微，程朱理学一直在这里占据着统治地位。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闕，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sup>①</sup>。所以，湖南文士多习理学，习汉学者很少。但无论治理学或者治汉学，都注重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论其功力则当首推魏源。他长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尤为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对湖南的学术风气有着很大影响。他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sup>②</sup>，其余学者如王文清、罗典、欧阳厚钧、丁善庆、邓显鹤、

① 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光绪九年版，首卷，第5页。

② 黄潜：《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00页。

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都是讲求程朱理学的，同时也都很注重经世致用。湖南的这种学术风气对曾国藩这一代士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曾国藩集团形成的思想基础。当时，湖南有两个名气最大的书院，“皆肇自宋代”<sup>①</sup>，一个是前面提过的岳麓书院，另一个是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几代山长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实际上成为培育曾国藩集团的思想教育基地。曾国藩集团的首领和骨干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都在这里学习过，非就学于岳麓，即肄业于城南，道光年间的山长欧阳厚钧、贺熙龄等人，就是直接向他们传道授业的老师。至于曾国藩本人之所以成为这个集团的首领，则又有其自身的原因。

## 家风与影响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sup>②</sup>，1811年11月26日（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南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的小山村里。这个村子座落在湘乡、衡阳两县之间的高帽山下，离湘乡县城一百二十里（今属双峰县）。白杨坪一带是丘陵山区，山青水绿，林茂竹长，风景十分秀丽，只是消息闭塞，文化相当落后。曾国藩在一首诗中说，“恨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sup>③</sup>。就是

---

① 吴博夫《湖南民性》，第12页。

② 曾国藩乳名宽一，1830年去衡阳读书时取名子城，字居武。第二年又改号涤生。1838年中进士后始改名国藩。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诗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诗集》），第3卷，第7页。

追述他幼时生活的环境。

曾氏祖籍衡阳<sup>①</sup>，清初迁于湘乡县荷塘乡大界里，嘉庆十三年他的祖父又把家迁到白杨坪。

曾国藩的祖父名玉屏，字星冈，父亲名麟书，字竹亭。曾麟书兄弟三人，排行居长，老二早殇，老三曾骥云无男，以兄子曾国华为继子。曾国藩一姊、三妹、四弟，共兄弟姊妹九人。曾国藩在兄弟五人中排行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称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称老六；四弟曾国荃字沅甫，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曾贞幹，字事恒。曾国藩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上只有兄弟姊妹八人，以曾国葆最小，曾国藩称其为季弟。

曾氏迁于湘乡之初，家境并不富裕，直到曾国藩的高祖曾应贞（字元吉）一代，才渐渐富裕起来。据曾国藩说，曾应贞年青时家中贫困，后来发起家来，积聚了价值数千金的产业，盖起几处宅院。曾应贞年老时除留下衡阳境内的四十亩养老地和一处宅院外，其余全部分给了他的子孙。从此，“子孙岁分其租以为常”。因为曾家的剥削生活是从曾应贞开始的，所以湘乡曾氏的族谱亦从他序起<sup>②</sup>。传至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一代，曾应贞其他支派的子孙已大多衰落，唯独曾国藩一家日渐富裕，成为一个据有百余亩土地的地主<sup>③</sup>。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个颇为善于经营的乡下财主，曾家的经济情况在他手上得到很大发展。曾玉屏年少时游惰不事产业，

<sup>①</sup> 曾国藩《衡阳彭氏谱序》（《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称，其远祖为曾参十五世孙，西汉末年以关内侯南迁避王莽之乱，成为南方诸曾之祖。先居江西一带，后分出一支迁往湖南衡阳，遂成为湖南曾氏的祖先。

<sup>②</sup> 据曾国藩在《祖四世元吉公墓铭》（《曾文正公文集》，第2卷）中的叙述可知，湘乡曾氏的系谱为：曾应贞——曾辅臣——曾竟希——曾玉屏——曾麟书——曾国藩。

<sup>③</sup>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964年台北影印版，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

经常骑着马跑到湘潭同一些纨绔子弟鬼混，或相逐于闹市，或日高酣睡。后接受别人的劝诫，卖掉马匹，徒步回家。从此，终生未明而起，苦心治理自己的家业。他家当时有一部分梯田，峻峻如梯，田小如瓦，耕作起来很不方便。他带领长工凿石开壤，日夜苦干，终于把小块梯田开挖成大块平整土地。为了增加农作物的收获，他精心研究各个节令与种植的关系；为了提高剥削量，他亲自督率长工耕田种菜，养鱼喂猪，彼此杂作，无稍空闲。曾家就是这样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对雇工的剥削（后者是主要的，前者数量有限）积聚起一份财产，并使之逐步增多。后来曾国藩把这套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为“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作为治家的信条，用以教育其诸弟子侄。考就是祭祀祖先，宝就是接待亲族邻里，早即早起，扫即勤扫屋宇庭院，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sup>①</sup>。这八个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乡下土财主的生活。

曾国藩为官以前，他的家庭大约仅达到中小地主的水平，不少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富农的特点。据他自己说，他的祖父、祖母和母亲，都一直没有脱离辅助性劳动，自己小时候也干过一些放牛、砍柴之类零活，但没有参加过主要劳动。甚至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之后，他还时常令女儿和儿媳每人每年给他做鞋一双，以考查她们的女工<sup>②</sup>。他与曾国荃同时封爵之后，又特地写信嘱咐在家掌管曾氏家政的四弟曾国潢说：“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记得己亥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他吃饭。’此语

---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② 《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



最有道理，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些工夫，以辅之以书、疏、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sup>①</sup> 这些情况都直接间接地反映了曾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及其对曾国藩的影响。

曾玉屏不仅是个生财有道的财主，同时也是个武断乡曲的小土棍。他“声如洪钟，见者惮慑”，村里人无不畏惧。邻里间发生什么纠纷，曾玉屏常常居间排解，充当仲裁人。倘若有人不服，他便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往往使一些性情倔犟的当事人神气沮丧，就此罢休，甚至还要携樽登门道歉，方可了结。

曾玉屏在家里更是个专制暴君。他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对家人动辄责骂，无人敢于流露出丝毫不耐烦的表示。曾国藩的祖母平时“度事夫子卑拙已甚，时逢愠怒则谏息减食，甘受折辱”，以求得曾玉屏的谅解和欢心<sup>②</sup>。曾玉屏对长子曾麟书责求尤苛，“往往稠人广坐，壮声诃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嗃嗃，诘责愆尤，间作激昂之词”。而曾麟书面对父亲的无理辱骂，则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sup>③</sup>。

曾氏先祖虽有过粗识文字之人，但并无人参加过科举考试。曾玉屏幼时本来是有条件读书的，但由于他放荡游惰，不以读书为意，所以早年弃学，文化程度不高。后来他成为乡里的头面人物，遇事又喜欢跑在人前指划，因而深感没有功名的缺憾，决心让自己的子孙上学读书，猎取功名，以跻入士绅的行列。他教督其长子曾麟书，“穷年磨厉，期于有成”。但曾麟书很蠢笨，十

---

① 《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② 《曾文正公文集》，第4卷，第53页。

③ 同上书，第4卷，第55页。